

文学现场

长篇小说的地域书写与高质量发展

——第二届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学术综述^①

吴义勤 范玉刚 郭 艳 等

摘 要：第二届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以“中国长篇小说的地域书写”和“浙江（钱塘）长篇小说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议题，众多学界专家以及创作界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展开深度讨论。经过会议的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地域书写已经由当代长篇小说的背景描述升华为核心叙事手段和意义产生机制，其目的在于用独特的地域经验表达来实现身份识别、文化共同体建构。本次论坛对地域书写的写作形态和美学路径进行梳理，对当下地域书写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文体危机作出分析，指出长篇小说的高质量发展要从语言坚守与文体创新、地域资源开发与时代精神契合、改善创作环境与批评支持等方面着手。论坛认为地域书写应超越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乡愁和地理局限，在地方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体现价值，文艺创作者也应加强创作和批评之间的互动，推动中国长篇小说由高原进入高峰。

关键词：长篇小说；地域书写；高质量发展；文体变革；媒介转型

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文化强国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两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十一周年的关键节点，第二届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如期举办。本次论坛围绕“中国长篇小说的地域书写”“浙江（钱塘）长篇小说高质量发展”两个主要问题展开，为创作界和批评界对话搭建了重要平台。

来自全国各高校、文学期刊的作家及文学研究者，围绕地域书写的本质价值、实践形态、现实困境，以及浙江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优劣情况与发展路径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形成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学术共识，为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一、理论维度的开拓与学科框架建构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一周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两周年。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文化强国建设和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进一步部署。在

^① 参会者主要有吴义勤、范玉刚、刘永春、谢尚发、郭艳、哲贵、江飞、温德朝、徐强、翟业军、张鹏禹、张永禄、吴宜平、周保欣、吴玄、海飞、朱晓军、赵顺宏、谭旭东、夏烈、郑翔、田振华等。

上个月召开的“两个计划”工作推进暨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中国作协提出提升作品质量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任务,目标是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扛鼎之作”。长篇小说创作者应将此作为共同遵循的基本共识,把质量放在首位,以深刻洞察、扎实写作与审美自觉回应时代期待,让精品成为新时代文学的鲜明标识。

自首届论坛成功举办以来,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本届论坛在延续三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以及第一届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向新的文学发展格局,继续关注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态势与理论问题。本届论坛将围绕近两年来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趋势、新成果展开讨论,聚焦浙江长篇小说的地域特色与未来方向,举办中文创意写作高质量发展工作坊,筹备成立中文创意写作联盟,研讨以叶炜等为代表的钱塘区长篇小说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我相信,这必将继续扩大当代文学批评的视野,丰富当代长篇小说的对话空间,培育中国文学更加活跃、更加健康的读者与创作生态。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本届论坛增加了对钱塘区作家作品的讨论,这和当前所倡导的新大众文艺创作不谋而合,及时贯彻了中国作协重视基层文学创作的精神,值得肯定。

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长篇小说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息,具备描绘现实、建构历史、发展叙事的独特能力。长篇小说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学创作实力的重要标志,对文化传承、阅读引领与审美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继续保持旺盛的创造力。“50后”“60后”作家持续推出重要作品,“70后”作家展现出稳定的创作实力,“80后”“90后”作家则不断以崭新的表达方式参与文学现场,网络文学作家也在拓展叙事边界、丰富文学表达。多代作家在同一文学场域中相互映照、彼此激励,形成了活力充沛、格局多元的创作景观。他们的作品既关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也体现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既触及城乡现实,也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对时代、历史、命运、人性进行持续而深刻的思考。

与此同时,浙江以其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创新的文学氛围,近年来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同样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希望本届论坛的举办,能够进一步推动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深化,准确把握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问题与未来走向,探讨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的规律,实现创作与研究之间更加紧密的联动。也期待本届论坛对近两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经验与不足进行深入分析,共同谋划中国长篇小说以及浙江长篇小说的新愿景、新路径。

长篇小说记录广阔时代,深入挖掘人性,其漫长的创作过程是对作家功力和毅力的试金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准的核心标尺。新时代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品,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与弱项。希望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成长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品牌,成为推动全国长篇小说创作、促进浙江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一是要加大对新时代长篇小说,特别是“两个计划”长篇小说入选作品的研究,克服对主旋律、主题创作和现实题材创作的误解,切实对长篇小说面临的艺术问题进行研究;二是要加强长篇小说文体及理论思潮研究,对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小说中的表现展开专业辨析;三是对长篇小说的艺术经验进行及时总结,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经典化作出贡献;四是对网络文学等新的艺术可能性进行敏锐追踪。相信在各位作家、学者与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论坛能够不断为中国长篇小说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范玉刚(山东大学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今天我们探讨的长篇小说地域书写,可拓展至整个文艺领域——文艺本就兼具地方性与民族性,而地域书写的核心命题,在于厘清其本质与价值指向。

地域书写对于作家来说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生活的简单再现。鲁迅笔下的鲁镇、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叶炜笔下的麻庄等相关创作,其中的地域特质,实际都是作家对地方经验的审美塑造,是虚构的艺术形态,更是精神原乡的载体,因此他们并非单纯的“地方性作家”。

地域书写的核心指向是通过特有的艺术表

现形式实现身份的标识和文化共同体塑造。方言俚语、民俗节庆、人物言行等符号构成文艺创作的重要背景。从哲学层面看,这也是文艺的属性,像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海德格尔关于世界和大地的真理解释等。地域书写是作家对于时代观察意识的具象化,是审美想象的创造,而不是现实的镜像复制。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大槐树、水井等意象都有很强的场域建构意义,这也是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等创作的逻辑之一。

在新时代语境下,地域书写重新被提起是为了冲破“生活真实”的局限,达成艺术创造性的审美提升。这就需要创作者把地方经验升华为文化积淀、文明意识甚至现代文明价值。地域不仅是文艺的空间维度,也是其时间维度,要融入新时代意识。这里的新时代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政治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指要符合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地域书写成为思想价值突破与审美创造聚焦的重要支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主动,到“两个结合”彰显的历史主动精神,地域书写凝结出独特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这种个性化文化表达,旨在让创作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艺形态的表征。优秀作家要树立思想高度,将地域书写与民族复兴的精神诉求相结合,在实现创作与时代深度契合的同时,践行兼具作家与思想家的双重使命。

刘永春(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天我们探讨长篇小说地域书写极具必要性,在我看来,地域书写的核心并非单纯书写地域,而是以地域为视角、以地域身份书写快速发展的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基于此,我将核心议题界定为“地域书写作为方法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思考过程中始终存在两点困惑。

其一,经典地域书写如鲁迅笔下的“鲁镇”,能够以地域镜像折射世界,但现代尤其是当代多数地域书写却难以实现这种超越——多数作品仅能呈现等同于或小于地域本身的视野。其二,当前地域书写易自动与乡土书写绑定,但对当下及未来中国文学而言,更亟待解决的命题是“城市作为地域如何表现”。事实上,当作家与生活或童年记忆中的地域形成对照镜像时,地域书写才能进入更深层次。以城市视角反思

乡村或以乡村视角反思城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书写的常见模式。

我将这类常见模式划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社会剖析的地域书写,二是作为审美镜像的地域书写。当前热议的新东北写作和新南方写作,恰好分别对应这两种类型。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书写的延续性传统,无论哪种类型,均与中国社会具象的、物理层面的现实发展紧密贴合,这是我的核心观察。

若想让地域书写如“鲁镇”般产生普遍意义,或以地域视角观照更广阔历史维度中的中国,就需明确:地域书写是构建当下中国的重要方法。当下中国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对地域书写的理解。因此,我更倾向于将地域书写中的“地域”视为动词、形容词,而非单纯的名词。

地域书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核心表征之一,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核心动力,也是其与世界文学的重要差异,构成了其民族化、本土化、自主化的主要形式。在此方向上的相关理论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主体性,强化创作中的地域性视角,对于重构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形态与未来方向有重要意义。

地域书写是方法而非目的,它就像宽阔的河流最终要汇入时代精神,纳入文学对社会的同步表现,超越具体而微的地域局限与地理特征,进而在叙事、人物、主题、艺术等层面生成普遍价值。地域书写需实现地域生活与普遍经验、城市与乡村、审美与思想、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平衡。这四大维度也是我后续深入思考长篇小说地域书写的几个维度。

谢尚发(上海大学副教授):我主要分享三点思考。第一,当前中国地域书写兴盛的核心缘由,在于每位作家都渴望在长篇小说中建构独特的文学世界,而这一目标背后,实则是小说叙事的空间建构命题。这一追求可回归巴赫金“时空体小说”^①概念加以解读——地域书写的

① 具体论述参见[苏]巴赫金:《长篇小说的实践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苏]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第 269—453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兴盛,本质上是长篇小说文体特性所规定的内在诉求,作家对地域的迷恋,正是为了通过空间建构实现独特文学世界的塑造。

第二,当前地域书写存在不够深刻的问题。多数创作停留在对“地方”本身这一概念的表层强调,却未深入追问地方究竟是什么以及地方如何影响长篇小说创作、地方能否提供真正的思想资源等。在长篇小说大批量生产的市场背景下,长篇小说地域书写背后隐含的是作家的焦虑。其通过贴上地域标签凸显自身,却鲜少从文学延伸至文化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探讨地方怎样规定着人。

人文地理学中的在地人文主义流派早已深入探讨此类议题,文学创作完全可汲取这些学科资源,以形象化表达和挖掘地方对人的深层规训。正如贝尔唐·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在地理批评中所言,文学常走在理论前端,人文地理学需向文学借鉴资源与思想。长篇小说的地域书写可由此抵达更深刻的哲理与思想层面,规避同质化困境。

第三,当前地域书写本质上是从总体到细分的过程。小说的核心使命是表现人性与世间普遍道理,而地域则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具体锚点,由此衍生出“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文学新浙派”等细分概念。这些创作虽取材与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但最终都指向总体性命题。正如清代理学家李光地所指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论地域多么独特,其承载的思想内核终究离不开普遍人性的共通之处。地方如何规定人恰恰是长篇小说地域书写的突破口,却常被作家忽视。总体而言,地域书写中局部与整体、普遍人性思想与独特地域取材之间并非割裂对立,而是存在内在沟通。有学者提出“文学藩镇”的说法,实则并不成立——各类地域书写始终统摄于统一的总体性命题之下。

二、创作实践的范式转型与美学表征

郭艳(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深刻而显著变化:地域性。地域不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背景或点缀,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核心的叙

事方法和意义生成机制,这种转变超越了早期“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之根的简单追寻。在全球与后全球化、现代与后现代转型的冲击下,地域书写已成为中国作家理解、诠释并以此批判性反思现代性经验的一种独特方式。近三十年来,地域从被描述、被观看的对象,变成了主动生成意义的主体。一是体现在作家的创作自觉上,在莫言等作家的笔下,故乡不再是简单的回忆对象,地域的坚守与重塑构成了对文化同质化的自觉抵抗,是对民族身份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安放的文学回应;二是地域书写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其不再局限于独特的风俗习惯或风景地貌,更深入到特定的地理空间所孕育的认知方式。地域成为中国作家理解现代性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工具。通过对不同地域应对现代性冲击的差异化经验的呈现,中国作家贡献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叙事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

具体而言,东北与江南的叙事,代表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美学体系。东北叙事寓意于独特的历史与自然环境当中,从殖民创伤、移民开拓到工业辉煌与体制转型,其文学气质中天然带有一种粗粝的史诗性与悲怆的集体记忆。其文本结构像一座大的工业遗迹,常呈现出断裂感和拼贴感,这本身即是对线性历史进程的隐喻性质疑。东北文学语言质地凛冽、硬朗,充满草根生命力。核心意象“工厂”象征着一个完整社会生态,当它突然失效时,留下的不仅是经济、精神上的困境,更是整个价值体系、意义世界的崩塌。相比之下,江南叙事则承袭了千年文人传统与市井商业文明,发展出一种精致、内敛、富于思辨的美学。其叙事结构如园林,讲究迂回与层次。文学语言湿润、细腻,作家擅长以通感与隐喻将物质细节转化为精神密码。江南叙事的独特性在于它接受了现代性的渗透,革命和改革不是通过暴力或制度变革完成,而是透过日常生活与审美趣味,实现缓慢深刻的渗透。

地域书写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东北叙事存在主题内卷化的风险,工厂废墟、下岗创伤成了东北文学高度符号化的主题,为了增强命运的对抗感,把人物置于极端的环境之中,人物很容易陷入悲情主义,成为承载历史控诉的符号化个体,而不能成为一个复杂的人。江南叙事由

于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而陷入精致茧房之中,钝化了把握社会变革的能力,还可能存在以美学化叙述代替历史内在冲突张力的趋向。另外地域特色在传播中很容易被简化成供消费的文化符号,削弱思想的深刻性,这也需要警惕。

我思考了未来地域书写发展的几条可深入研究的方向。一是地域书写维度,不能把地域仅仅当作故事发生的背景,地域应该是独特的现代个体认知框架和世界观的来源;二是要加强地域的批判功能,不能停留在简单的风情展示或文化乡愁上,而要加强在地域内部复杂矛盾和冲突的挖掘;最后是建立地方与全球的对话,把中国的地域经验置于全球视野之下,使之成为全球经验的一部分。

哲贵(《江南》杂志主编):地域书写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多元样态,这从上月在西湖畔举办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创新论坛的讨论中,我们便可窥见。当时论坛虽不限于长篇小说,但其揭示的创作现象具有普遍意义。与会者中,叶兆言老师是在地书写的典型代表。他长期生活于南京,并且一直书写南京,他的作品深度参与了南京文学形象的构建,使其自身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外三位小说家所代表的离乡书写,他们离开最初的生长地,定居于新的城市,然而核心的书写对象,却是曾经的故乡。物理空间的迁徙并没有割断创作的精神脐带,故乡作为经验源头与情感原乡,远离后反而可能获得更强烈的艺术和审美创作意向。叶兆言老师的南京书写,则可视作为上述第一种模式的动态深化。他长期扎根南京,其创作不仅持续描绘这座城市,更让作品本身随时代变迁、历史冲击与个体生命体验的沉淀而不断生长,实现了地域书写在时间纵向上的拓展与深化。

地域书写还有第三种特殊的写法,叫作精神原乡、情感投射式书写。作家柳建伟的祖籍是河南,后来长期生活在北京,但是他的《钱塘两岸》写的却是八十年前抗战时期的浙江,这部作品似乎与他没有地缘关联。但是,当充分了解他的创作动机后,我们便会发现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甚至可以从细微之处看出他所付出的努力。对柳建伟来说,浙江不是他的

血缘故乡,但是由于长期的情感投入,已经成为他情感认同上的故乡。所以地域书写中的地域可以脱离物理限制,指向精神空间。

当代文学中的地域书写至少呈现出三种类型:一是在地生长型,作家与地域共生,并且创作书写随时代演进;二是离乡回望型,作家远离故乡,深挖记忆中的故乡;三是精神建构型,作家以非原生地为创作的精神原乡,并且通过深入考察与艺术想象进行地域书写。这三种路径丰富了地域书写的内涵,证明地域书写的核心并非简单的地理位置,而是蕴含着身份认同、情感归属、历史思考与艺术创造等多种因素。

江飞(安庆师范大学教授):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长篇小说的地域书写,已经从背景演变为核心的叙事动力和思想方法。地域不再仅仅是故事中的静态背景和风土人情展示窗口,而是叙事发动机。各地域作家通过辨识度鲜明的地理空间来勘探历史、书写时代转型和人类普遍境遇。总体来看,其有三个核心板块。

其一,对传统乡村与都市地域空间的深化和超越。一方面,乡土叙事开始结合新时代山乡巨变这些国家命题,如张炜《去老万玉家》。另一方面,都市叙事摆脱千城一面的现代性符号堆砌,转向对特定的城市精神内涵的挖掘,如王安忆对上海的书写。其二,新东北、新南方写作颇具活力,除班宇、双雪涛外,老藤的《北爱》等东北题材长篇更值得关注,他们书写了东北壮阔的全新图景。其三,县城写作已经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显微镜,像张楚《云落》、苏童《好天气》等均聚焦城乡交叉地带;边地抒情类写作亦有突破,邱华栋的《空城计》书写西域古城、贵州作家冉正万书写屯堡,拓展了地域书写的边界。现在的地域书写应突破流于表层的自然风物、方言习俗,转入对地域中人性结构、情感模式、精神气质的勘探。

当然,我更倾向于阐述当前地域书写存在的问题:一是同质化危机,全球化、网络化正在消弭地域外在独特性,部分书写陷入了方言、饮食、民俗的简单符号化堆砌,未触及地域深层次的精神内核。二是经验危机,现在的地域书写,很大程度上依赖文献知识和表面的实地考察,知识书写取代了生命体验,导致地域书

写缺乏真切可感的情感与思想关联。三是语言危机,即对方言使用的把握度,过度使用会造成阅读障碍,完全放弃则流失背后承载的文化密码,如何在普通话的主流叙事中有效融合方言神韵,亟待解决。这归根结底是思想危机,在书写具有地域特色的长篇小说时,创作者须把个体的、集体的精神困境作为精神哲学的历史纵深进行思考,而不是陷入简单的离乡归乡模式当中。

地方不是文学的边界,而是通往世界的起点。地域书写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具体生动的地方叙事,拼合折射出充满内在张力的整体中国形象。我们也期待优质的地域书写能达到“记其地、知其世、明其人”的境界,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创作者要从地方性坚定地出发,最终抵达广阔的世界性。

温德朝(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在当今全球化与文化“空间转向”的学术语境下,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中的地域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涌现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等概念,乃至我所在的江苏省内关于“故黄河写作”的理论探讨,都与此密切相关。这让我们用新的视角,逆向思考文学中的地域书写。

值得肯定的是,在当代叙事中,地域不再仅仅是文学创作中简单的故事背景,它肩负着空间叙事的功能。地域建构起了故事发生的公共场域和精神原乡。正如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以及叶炜笔下的苏北鲁南麻庄。叶炜近几年无论是以乡土、革命还是知识分子为题材,都以它为背景,显然地域是他写作的精神原乡。

一个作家持续聚焦特定地域,深入审视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融合共生,由此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对世界认知的窗口和作品深层的思想价值,这正呼应了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所论述的文学作品的形而上学质。

地域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中具有叙事功能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象是东方美学的特色,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专章论述了意象叙事。长篇小说里的地域发挥着意象功能,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山和水以及桥的意象,常常是转换、联系或者决定情节走向的因素。由此可见地域意象

已经深入叙事逻辑当中,成为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综上所述,在当下的创作和研究中,地域已经由原来的静态背景变成了具有精神原乡、形而上学质以及核心叙事意象功能的复合载体。

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若将长篇小说视为一种“百科全书”,那么它首先应是地域文化的百科全书。我个人对此深感兴趣,并在主持创意写作教学时,将地方采风与研读地方志作为课程的重要起点。

在教学与观察中,我深切感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地域性的关注虽早有脉络,但当下的语境已截然不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域性尚非稀缺资源;而今天,无论在我们的学生还是一般读者中,地域性作为一种审美特质乃至知识来源,都已相当稀薄。学生群体在语言、趣味、用品上高度同质化,个人身上的地域烙印日趋模糊,自然对地域风味的文学缺乏敏感。

今年上半年,我带领学生在中朝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采风了半个多月,这一经历让我对地域这一概念的当代境遇有了更切实的感受:地方性与民族性正成为一种亟待关注的稀缺资源。在此背景下,长篇小说重拾地域百科全书这一目标,就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

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等理论已关注到作家的籍贯、生活地理与书写地理。顺着这一思路,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个作家的籍贯地理、生活地理与其笔下的中国地理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以作家叶炜的“乡野新风四重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为例,他身处江南,书写鲁南(齐鲁文化),这是一种有距离的“故乡书写”,而不是简单的“家乡书写”。小说中那位希望作家来书写本地的地方官员,其动机可能掺杂行政需求。但作家本身为何书写,以及以何种思想和审美进行书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离开故乡后的生活经验与更广阔的视域,赋予叶炜的创作以反思性。他跳出了纯粹的地方文人记述方式,避免了文化部门编纂式的写作。在地域性普遍缺乏的今天,长篇小说是否可以成为有效的文化容器,并不能只从书写地方来判断,更应该看作家能否超越自身,用审美的眼光来提取和升华自己的地域经验。

三、媒介生态变迁与文体危机应对

翟业军(浙江大学教授):首先我们要承认每种文体都是有生命的,有生长也有消亡。长篇小说的兴起,源于人们对异己新奇经验的需求,就像本雅明所言“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①,我们通过听故事的方式来获取经验。但是媒介翻新、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短视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长篇小说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更需要读者数日的沉浸式阅读,这在当今快节奏、碎片化的社会中显得不可思议。长篇小说虽未消亡,却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它的存在意义和可能性。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长篇小说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性。长篇小说作家用身体而非单纯用眼睛去感知世界,他们捕捉不可感知的内核,并且以隐喻呈现基座性现实。这种绵长的感知积累需要时间的积淀,所以天然呼唤长篇小说这样一种体裁。当今以视觉文化为主导的媒介,遵循力比多经济,靠煽动、排泄受众欲望获取流量,它们并不关心受众的精神状态,甚至利用受众的精神创伤维系欲望循环。而长篇小说从不往伤口上撒盐,它要做的是描述伤口形状、揭示创伤成因,为时代做精准的精神分析。

第三点我想简要谈谈地域对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地域深刻影响作品的主题与人物特质。俄罗斯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孤独、绝望,这源于它地广人稀的地域特征,如《草原》中主角在草原上行走,十日内不见人影。而在毕飞宇笔下,20世纪70年代的平原世界里,村庄密集、资源有限,仇恨与权力成为作品主题。新世纪的南京则不同,《推拿》《欢迎来到人间》等作品中,陌生人社会里仇恨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失重和忧郁化,如《欢迎来到人间》的主角傅睿,名字为“Free”的谐音,但他越自由越忧郁,相比之下他来自其他地方的同事郭栋,受到打击后依然积极向上。可见,地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极为深远。

张鹏禹(《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我的发言题目是《媒介变革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危机》,当下长篇小说创作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鲜有破圈并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作

品,现在大多数作品都面临读者匮乏的危机。我们回望历史,莫言早在二十年前就发表了《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他指出,长度、密度与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长不是影响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好才是长的前提。时隔近二十年,这一观点依然成立,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代语境已发生多重变化。

这一变化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是全球化加速期的到来使人们的生活被碎片化切割,从而造成了注意力的分散。罗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在《注意力分散时代》中提到启蒙运动就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启蒙经典已经被数字信息所遮蔽,慢性注意力分散使得稳定的思想难以获得,我们尽管需要经典却难以再构建经典。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与时代深度融合。基辛格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中警示,人类的知识状况可能正经历麦哲伦式革命,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地球的理性引擎,这可能意味着人类理性主导世界的终结。如今很多人依赖AI筛选和组织信息去认识世界,而不是通过具身体验,且算法黑箱问题让人类难以理解AI的认知生成过程。

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下,我们思考长篇小说的文体危机。一是阅读耐力的消退,碎片化生活使读完一部长篇变得很难。网络文学领域出现短篇兴起的潮流,网文作家也正受到微短剧的冲击。二是市场数据的萎缩,图书零售市场码量已经连续多年呈现下降趋势,今年上半年同比仍为负增长。三是创作主体的嬗变,人类写作已经在部分领域被人工智能取代,有作家自嘲其可能是最后一代手工写作者。

回到核心问题,我们是否能回应时代语境,催生出新的长篇小说样态?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18世纪英国现代小说的兴起,是因个人经验取代了传统文学中以集体神话或史诗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小说不但是文学形式的革新,也是与现代性相呼应的文化工具,其用一种可以感知的方式表现世界的面貌,反映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成熟以及个人

① [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修订译本),张旭东、王斑译,第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自由诉求对文学的影响。媒介的发展和文学样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网络文学、短视频与技术同时发展,长篇小说创作也要主动适应时代。值得注意的是,《烟霞里》《平乐县志》“乡野新风四重奏”等作品已经开始了文体变革,纪传体借鉴、模仿传统的志书、将信件混合使用等多种方式被采用,这种变革也许和碎片化的生活语境相对应,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当下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能否像18世纪英国现代小说一样开拓出全新题材,我想这考验着作家与批评家的眼光和格局。

张永禄(上海大学教授):我想就长篇小说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可能谈几点思考。首先,关于对长篇小说发展的普遍焦虑,我个人持相对平和的态度:长篇小说的确出现了危机,它作为主流叙事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介环境,是由网络文学连载与短视频即时冲击共同塑造的,其内在逻辑和传播语境已发生了转变,从而与传统长篇小说的创作、接受模式产生了巨大隔阂。这种时代的隔膜,就像我们再回头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些文学现象与作品,不能全然理解和共鸣一样。

关于长篇小说如何发展,我不拟从纯理论层面展开,而是想结合我对创意写作的实践与观察,提出三个方向性的构想:其一,我们要倡导慢写作,重拾经典的深度与智慧。长篇小说高质量发展,应该对标传统经典作品。经典作品的作家往往用多年心血熔铸一部作品。反观当下,键盘写作极大地提升了书写速度,部分作家乃至网络写作者日更数千字、年出一部长篇已成为常态。然而,写作并不是简单的拼手速,许多高产作家的作品质量平平,甚至不及其早期的作品。长篇小说不仅是技术活,更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与生命智慧。遗憾的是,不少作品仅停留在输送庸常识见或情节消费的层面,不能提供精神启示、情感共鸣或批判性思考,其价值甚至难以与深度新闻报道或优质短视频内容相比。因此,当代作家有必要写慢一点,再慢一点。回归对生活的沉潜体验与对人生的洞察,这是向经典致敬的必经之途。

其二,期待兼职写作成为高质量作品的新兴源泉。在人工智能辅助写作日益普及的大环

境下,单纯靠写作谋生的专业作家比例可能会减少,其他职业背景的兼职创作者可能越来越多。当千行百业的人们投入长篇小说创作,他们所带来的独特行业经验、人生故事与生命感悟,很可能为文学注入新鲜血液。这些来自更广阔生活领域的书写和创作值得期待。

其三,拓展长篇小说的社会文化功能。过去我们把小说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但在当下,它的地位已然动摇。长篇小说作为形而上精神家园守护者的功能,已被部分哲学、宗教或其他媒介分流。因此,我们创作者有必要反思并拓展长篇小说的功能维度,在保留精神探索价值的同时,强化形而下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文化功能。小说可以更积极地与文化经济、公共文化建设相结合。一些作品,如叶炜的新作“乡野新风四重奏”等,其对艺术乡建、新农村建设的文学呈现与思想参与,所带来的社会文化价值甚至不亚于单纯的文学价值。在未来,长篇小说或许应更注重其作为文化产品、文明交流与对话载体的功能,这可能是长篇小说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

吴宜平(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我想就地域写作的生命力与未来出路简单谈几点思考。我近期集中阅读了“知乎盐选”等平台的作品,发现未来通俗小说创作可能会有新的转向,就是进一步向短篇、精悍的方向倾斜。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其能够打动人的核心在于情感表达的真挚、对生活独到的观察,以及深邃的思考。一些广受欢迎的作品,无论是情感叙事还是硬核科幻题材,它们的成功均建立在作者对生活、对专业知识扎实的理解与考证之上。

回归地域写作本身,其未来的终极目的,绝非为了怀旧或固守某种文化标本,最终还是要回应人类的共同命题。在现代性的处境下,人们充斥着无根感和焦虑。而地域写作的价值,可以从具体的地方知识与经验中,提炼出具有共通性的生存智慧与珍贵的情感资源,最终为读者提供一种可以安顿心灵的地方感。优秀的地域作品,应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地理传记,既深植于一方水土,又照亮更广阔的人性共同境遇。

在具体创作路径上,作家叶炜的新作“乡野新风四重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程度的参

考。优秀作品不应是简单的风物志式的陈列,而是对故乡进行一种显微镜式的深度考古,去书写社会结构与心境变迁。这种深入肌理的写作方式,在未来雅俗共融的创作生态中,尤其值得借鉴。未来的地域写作,应将地方从一个封闭的描述对象,转化为一个开放的、充满思想张力的文化场域,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开辟新的可能,使地域真正成为连接个体情感与人类共同命题的创造性空间。

四、浙江书写的本体审视与发展路径

周保欣(海南大学教授):我较早将地方性这一概念引入当代文学研究,虽然不乏反对声音——有学者认为文学只有好坏,没有地方之分,但地方性绝非伪命题,因为不存在普遍的中国经验,回顾历史我们便知,中国各地历史发展差异显著,很多区域的发展历程与整体中国史是不同步的。就像我们常说的封建社会,在中国现有的地理版图中,有些地区甚至从未经历过。浙江南部如温州一带,历史上是否属于分封制、是否经历封建社会都值得商榷,浙江真正融入中国大历史,实则是五代末期纳土归宋之后。所以说,不存在普遍的中国经验。

其次,作家的创作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是人地融合的产物,地理环境不同,文化的形态、创作资源不同。反过来讲,比如何书写地域文化更重要的是,地域如何塑造和影响了作家。这种塑造既有显性的、能被作家即时发现的影响,更有深层的无意识影响。将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笼统归为陕西作家并不恰当,路遥成长于黄土高原,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开篇从天地垂直视角切入,自带高原直上直下的认知思维。陈忠实的《白鹿原》开篇交代人物老婆的四面八方渊源,这说明平原这个地理形态对作家的空间思维有影响。而贾平凹的《商州》《秦腔》等作品用的是《山海经》式的写法,写完河写山、写完山写村镇,这和他生长在商洛山地环境有关。再如河南作家李佩甫,他的作品常提到“四通八达”,河北作家胡学文写逃荒会清晰标注不同方向的路线,反观浙江舟山作家很难写出四通八达这种表述,

以上这些都是地域塑造作家思维的鲜活例证。

当今讨论地域书写,需关注流动性这一新特征。过去我们讲地域文化,多将地方视为静止的,但今天,“新南方文学”“新东北文学”等概念的出现,在新旧时间维度的对比下,让我们重新认知中国,认知地方。以我自身经历为例,我从杭州赴海南任教,最初竟然有前往流放地的刻板印象,实则海南是连接湄公河流域国家与东南亚各国的十字路口,可以用四通八达来形容,当地先民的《更路簿》(记录出海水文、气候的文献)便印证了其早期的海洋性特质。反观杭州,我个人看来反而更像一个神经末梢。再如新西部文学创作,如今书写河西走廊、新疆,已摆脱过去中原中心主义的边陲视角,而是将之视为连接中国与欧洲、西亚、中亚、印度的中介枢纽。这意味着,当下的地域书写需立足何以中国、何以地方的立场,重新发现和书写地方。

我们应摒弃刻舟求剑式的地域理解,尤其反对以行政地域划分作家。中国行政区划不具备充分的文化说服力,以自然地理划分更准确——比如安徽被淮河、长江分为皖南、皖中、皖北,三地文化、生活形态截然不同。河南虽以平原为主,但伏牛山一带及洛阳以西区域,与平原地区差异显著。地理是历史的说明书,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很大程度上由地理决定;而地理也可在相当程度上解释文学史与文学现象。比如讨论浙江长篇小说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对比当代与五四时期的作家数量,更应关注浙江的文化气韵与时代文化气韵的契合度与碰撞点,这才是理解地域文学发展的关键。

吴玄(《西湖》杂志主编):本次论坛中关于“文学可能不需要语言,或语言不再重要”的观点令我深受触动。这一观点对浙江作家的冲击尤为显著——浙江作家向来对语言有着极致的执着追求,正如郭艳老师提及的江南写作相关特质,我身处浙江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浙江作家对语言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若非打磨至满意,绝不轻易示人。

语言和文体天然存在着联系,浙江作家由于对语言的极致追求,所以更适合中等篇幅的创作,在长篇创作上遇到挑战。拿我们浙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鲁迅来说,他的创作重心都在中

短篇上,并未涉足长篇小说,这与他对语言精度的极致把控密不可分。即便在未来,语言的重要性可能有所弱化,超长篇创作(如网络小说动辄千万字的体量)成为可能。但在我看来,一部鲁迅式的短篇小说,其价值远胜于千万字的冗长文本。对浙江作家而言,坚守语言追求仍是值得肯定的创作立场。但是若要兼顾语言追求和长篇小说创作,其中矛盾困境只有创作者自己才能体会得到,外人难以给出直接解决办法。

关于地域写作,此前已探讨过作家如何书写地域的命题。对创作者来说,地域书写是一种天然选择,并且往往和创作者的童年经验、故乡记忆绑定。相较于陌生的地域,故乡的经验储备更为丰厚,书写故乡是最便捷的选择,不需要创作者耗费大量精力进行考察和验证。

地域书写的核心并非是否虚构了故乡,而在于厘清写作者与地域之间的关系维度。若以古典主义创作视角观之,写作者与地域可能处于零距离状态,其作品中充盈着优美的乡愁。进入现代主义创作语境,写作者与故乡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对我来说,故乡有一种陌生感,而正是这种陌生感和遥远的距离感催生了独特的创作形态。正如加缪所言,当个体对原本熟知的故乡产生突然的陌生感,荒谬感便随之产生,而这正是现代主义写作的重要源头。

最后我想说,对作家来说,地域书写本身并非难题,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自身与地域的关系属性及距离维度,不同的距离感会催生不同的小说形态。在创作语境中,地域绝非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写作者价值观的具象化呈现。

海飞(《浙江作家》主编):作为创作过长篇小说的作者,我的思考源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而非理论推演。我始终在探寻一个问题,即为何东北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个性鲜明,而南方年轻一代作家的个性标识却相对模糊。这是客观存在的创作现象。无论依托怎样的创作概念或表达路径,南方作家群体始终未形成类似东北作家的鲜明特质,这背后成因值得我们深究。

同时,我也在反思县城写作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县城写作绝非简单的复刻县城生态,这一概念已引发诸多小说创作与评论探讨。我曾读过一部几十万字的抗战题材作品,书中每个

章节标题均为城市名称,城市空间随情节推进不断切换,形成典型的城市书写特征。这让我联想到我自身的创作,我出身农村,所以早期写作多聚焦农村题材。但如今的农村书写存在明显断层,要么题材创作式微,要么仍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农村叙事,比如写看瓜棚等旧场景,却忽略了浙江农村的现实变迁。如今的浙江农村,不少家庭住别墅,庭院停多台车,农田仍在却风貌已然更新,这类鲜活的当代农村图景在当下很多创作中却近乎缺失。

转向城市书写后,我有过谍战小说创作经历,曾书写南京、宁波等城市,但事后反思发现,我对这类城市的书写可能流于表面,没有真正触及城市的精神内核。我常与同行及年轻作者交流创作,意识到无论书写人性还是其他主题,核心应聚焦人与人的关系,构思情节时不必过度堆砌,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诉求。这引发我进一步思考,文学语言与强大故事内核的结合,能否让小说更具感染力?因此我们南方创作未必只能局限于细腻温婉的风格,强劲的故事张力或许能为小说开辟新路径。更深层次的探索在于,能否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叙事提升到人与城市的维度。我个人有从农村到诸暨工作十余年、再到杭州生活近二十年的经历,每一个地方的生活状态都有明显差异,创作的关键或许在于人与城市的融合程度。

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精神气质,比如绍兴下辖五县各有绰号,嵊州、新昌被戏称为“强盗县”,绍兴则因师爷文化被标识。绍兴的独特文化特质赋予绍兴人内敛的性格,师爷群体更是通过跨地域任职形成的庞大关系网络,深化了城市的文化基因。

深入的地域书写,不在于复现街道、房屋等景观,而在于捕捉并呈现那像血液般在城市中流动的、人与城相互塑造的精神气息和情感联结,这让作者的生命经验与城市的脉搏深刻契合,进而使其创作出更多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朱晓军(浙江理工大学教授):作为一名非虚构作家,我想结合自身创作经历谈一下对地域书写的认知。相较于虚构文学对地域书写的聚焦,非虚构写作群体通常没有明确的地域书写概念,至少在我的创作实践中,从未主动将地

域作为核心命题去考量,更多的是基于写作题材的自然延伸。

我的生活轨迹一直存在跨地域流动的现象,出生地是沈阳,在齐齐哈尔长大,之后一直在哈尔滨生活,直到48岁时才搬到杭州。这就使得我在不同的地方感受生活,自然而然形成了我之后的写作途径。近二十年来,我的创作重心一直在浙江,先后书写了金华、杭州、温州等地域及相关题材。但是在这类创作中,我并没有刻意去思考自身和地域的关系,而是集中于怎样准确把握书写对象的地域文化特点。

作为外来书写者,我有自己的创作方法论。以我写温州中国农民城题材作为例子,为了突破作为外地人的认知局限,我会选择在当地租房旅居一段时间。这种沉浸式体验能让我深入观察当地生活,接触本土群体。这样不仅能拉近与书写对象的心理距离,更能直观捕捉不同地域文化中隐含的生活逻辑与精神特质,避免对地域的符号化、表面化书写。

此次论坛中,各位专家关于地域书写的探讨对我极具启发意义。此前我更多是从题材适配的角度去思考,没有从创作理念层面审视地域与写作的关联。这次论坛让我意识到,地域不仅是非虚构写作的题材载体,更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创作价值与思想维度。因此在以后的非虚构创作中,我会把地域书写相关思考融入实践中去,探索地域与非虚构叙事的更多可能性。

赵顺宏(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关于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质,在地域之外,我认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相对于中短篇小说极高的语言要求,长篇的成败往往更取决于整体架构。这种结构既有外在的谋篇布局,更有内在的、决定作品最终美学形态的深层逻辑。一部长篇如何处理其庞杂的素材,是呈现为一种审美整体,还是写成社会史、地方志或其他,其根本的分野正在于结构。

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范式正在发生代际演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其作品常依赖于一种宏大的社会史结构,或是对该结构的解构。而新一代的70后作家,则逐渐脱离了这种依赖。近期阅读的几位70后作家的长篇,包括叶炜的作品,显示出一种新的趋向,他们更

多地采用了一种类似“沉香”般的、空间化或块茎式的内在结构。这或许预示着审美把握方式正在发生代际性的转变。

具体到叶炜的长篇新作“乡野新风四重奏”,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品读,他的作品,语言读来十分流畅顺达,可以看出他作为小说家的天赋语感。这种语言风格,或许与他自身的成长背景及艺术追求有关。我甚至觉得,若非从事写作,他或许因能充分驾驭那种质朴而富有表现力的民间叙事形式,成为乡间一位出色的说书人。

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作为读者我也感到一丝隐隐的期待。以莫言为例,莫言小说的语言在“土”与“洋”、通俗与精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张力,甚至包含不少生僻字词,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魅力。相对来说,叶炜小说语言的气象与追求明确,但在这种语言的内在张力与创造性冒险方面,似乎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仅是我个人的一点阅读感受,权作交流。

五、跨学科视域与批评范式重构

谭旭东(上海大学教授):结合各位专家的发言,我想简要分享三点思考。第一,关于长篇小说创作中大时代叙事的反思。当前我们谈到长篇小说创作应该聚焦大题材、大主题、大时代,但回溯历史,从“文革”结束后到改革开放属于大时代,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变化、社会结构转型是大时代;再到新世纪,媒介变革,我们加入WTO融入全球化进程,我们似乎始终处在被定义的大时代中。

值得深思的是,我们每次提及大时代,似乎都隐含了一个小时代作为对立假设。但现实是我们从未脱离所谓大时代的范畴,当大时代成为唯一叙事框架时,这一概念本身已失去成立的前提。因此,文学创作究竟应秉持何种立场与属性,仍需要更精准的理论概念与话语体系。我认为,文艺研究和创作者在肯定当下创作环境的同时,有必要审慎探讨大时代是否为长篇小说叙事的最合适表述。

第二,文学地域性标签的审视。我们前面也提到,地域代表作家有很多,当前新东北、新南方、新北京等地域写作概念备受关注,但从本质

上看,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被纯粹的地域属性定义。就以我为例,我籍贯湖南,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现居上海已八年,若按地域标签划分,难以界定为湖南作家、北京作家或上海作家。对写作者而言,文字是心灵世界的投射,是与世界对话、传递自我认知的载体,不应被地域框架所局限。在此需区分创作与评论的话语体系,评论界为满足学术概括与文章撰写需求,难免会使用标签化词汇,甚至伪命题式概念。但对写作者而言,面对创作本身时,应审慎对待这类标签,避免被其束缚。

第三,我想谈一下小说创作中两种记忆的处理。这两种记忆分别是童年记忆与流动记忆,基于长期阅读经验,我认为童年记忆具有永恒性,是深植于生命深处的核心体验,正如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空间诗学》中所强调的,童年记忆具有永恒价值。而成年后的记忆多为流动易逝的,随生活变迁不断更新且易于遗忘。作家需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

回望百年现代文学史,“五四”以来流传至今、仍具可读性的作品,多是植入了永恒童年记忆的创作;而以流动记忆为主的书写,鲜有能跨越时间留存的经典。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西方经典作品,真正感人至深的文本,均成功将永恒的记忆凝固于文字之中,触动读者心灵。

因此,作家如何实现两种记忆的有效融合,是提升作品生命力的关键。我也正计划围绕这一主题,结合叶炜的新作“乡野新风四重奏”等作品撰写专文探讨。

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地域问题,我想从位置这一维度谈起。地域最先赋予我们的,是一种位置感,既包括故乡、原乡这样天然产生的情感位置,也包含创作者在认知和评论过程中形成的视角位置。位置有多种层次和层面。第一个就是地理位置,一个人辗转多地生活就会形成多个地理位置标识。第二个就是文学所赋予的心理和精神位置,位置有超越地理的可能。第三个为社会位置,即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职位、奋斗历程等都会对我们认识世界产生影响。最后是互联网时代产生出来的数字位置,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即使身处边缘地带,也能够利用网络拥有话语权。以上这

些位置都与地域有着密切联系,文学应该关注这种多元的位置属性,也应该关注地域对个体的影响。

用我比较熟悉的网络小说来分析,网络小说长篇创作与地域书写的关系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早期网络文学常常选择北京、上海、成都等具体的城市作为地域题材,但是它并不是简单地展示地方风情,而是用地理坐标来抒发一代青年的共同心理,也对现实进行批判。互联网赋予的数字位置,具有去中心化、平民化、自由的特点。

2015年前后网络文学创作出现了重大变革,主流社会呼吁关注现实题材的口号出台以后,许多网络作家开始主动地对接地域、重大现实命题。网络作家从弥散状态向某种再中心化运动,其优秀的成果就有机会进入传统的主流文学视野。

此外,网络文学还催生了另一种创新路径。有些作品并没有刻意表现地域,但是意外地形成了鲜明的地域IP,并带来了文化红利。科幻小说《我们生活在南京》虽然主要讲述的是未来叙事和时空穿越的故事,但却成功把南京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故事空间。同理,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用历史传奇的方式,激活了古都的地域魅力。这样将类型小说同地域文化融合起来的做法,创建起地域IP创作的新场域。

纵观网络长篇小说二十余年的发展,地域始终是其书写的重要维度,但它的内涵和功能一直在更迭,并且呈现出在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自由表达与主流引导、弥散与聚焦之间不断刷新、纠缠的辩证关系。这为所有创作者提供了多元参照,使其在坚持个体化的精神位置书写的同时,亦可主动参与地域现实的主流叙事。

郑翔(浙江文学馆研究员):我对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均有涉猎,但阅读过后往往难以感到满足。我想这个问题的核心可能是,许多作品的文化含量与思想重量匮乏。

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写得很好,但和鲁迅作品的厚重相比,其在思想穿透力上仍显不足。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认为,小说的道德在于是否为人类认知提供新的可能。我们深

入阅读近年来一些获奖长篇,会发现它们往往止步于输送庸常的知识,未能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提供独特的新经验或具有启示性的新知。耗费大量时间阅读一部长篇之后,读者理应期待从中获得某种智识上的深化或顿悟,但此类体验目前却颇为稀缺。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作家自身文化积淀和思想深度有关。有些作家虽然知识面较广,但是没有将知识淬炼成文学思想,更没有将其艺术地呈现出来。另一些作家本身文学修养不深,造成作品质量不高。如果创作者仅仅依靠在创作某部小说之前恶补相关知识,那么其作品中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生硬的掉书袋气息,暴露了其文化储备的不足。语言作为文化的直接载体和文学的第一道关口,在很多作品中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其精纯度和表现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思想文化贫瘠,在地域文化书写中就格外明显。地域书写如果只是风情展览,那么所谓的地域文化就会成为掩盖思想苍白的遮羞布。

因此,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关键,并非题材或地域的选取,而在于作家是否具备足够的文化底蕴、思想能力与语言功力,将其创作题材转化为具有认知价值与审美重量的文学建构。(文字整理并节选自论坛发言,未经本人审阅。整理者:孙彤。)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创意写作前沿理论文献的翻译、整理与研究”(23&ZD2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玉刚,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文化与文化产业;郭艳,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等。